

林毅防治乳腺癌复发转移的策略与方法

司徒红林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广东省中医院乳腺科(510120)

乳腺癌手术根治后,仍有10%~50%的病例出现复发或转移,即使在淋巴结转移阴性的患者中情况也是如此。其复发转移多发生在术后2~3年内,3年复发转移率为13%,2年内复发率占总复发率72.5%。如何预防乳腺癌术后复发转移已引起广泛关注,成为乳腺癌防治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医学认为乳腺癌从一开始就是毒邪与正气不断相争的过程,正能胜邪癌瘤可不至形成或发展缓慢,或趋于稳定和好转,甚至消失;正不胜邪则癌症形成并逐渐发展,甚或进展迅速。中医乳腺病名家林毅教授认为,正气亏虚、正不抑邪是乳腺癌复发转移的基础条件,而余毒未残留是复发转移的关键因素,痰瘀内阻为复发转移的重要条件。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与复发转移是因虚致实、因实更虚、虚实夹杂、痰瘀交阻、瘀毒致变的复杂病理过程。因此,林老提出“扶正祛邪”是主要的治疗原则,理论上包含扶正固本、抗癌祛邪和二者兼用三种方案。弟子随师临证,总结林老对乳腺癌既病防变的治疗策略为“时时扶正、适时祛邪、随证加减”。

1. 时时扶正

意即为扶正固本贯穿于整个治疗的始终。林老认为,乳腺癌之所以发生、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体正气的虚衰,只有在人体正气亏虚的前提下,邪气才可能侵袭流注于乳房,并积聚变性,形成瘤肿,致生乳腺癌,并可能不断发展恶化。因此,在治疗乳腺癌之时,林老强调应至始至终“时时扶正”,正气来复,邪毒自去。而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元气的盛衰,气血的虚实,关键在于脾和肾。因此扶正固本主要就是补脾肾,养气血。常用方法有益气健脾、滋阴补肾(或温阳补肾)和脾肾双补。具体运用时还应根据各脏腑的特点及其虚损情况进行调治。其中,应注意各脏腑间的相生关系,采用“虚则补其母”的间接补法,如培土生金、补火助土、滋水涵木等。

① 益气健脾法

林老从临床上观察,乳腺癌患者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除出现局部癌变的特殊症状之外,常会出现神疲乏力、面色少华、食欲不振、腹胀腹泻、舌淡苔白腻、脉濡细等证候。特别是在患者经过手术、化疗之后,更易出现上述脾气虚衰的表现。林老认为人身禀受先天之肾气而生长发育,依赖后天水谷生化气血精微,滋养机体。因此,脾之盛衰与身体的强弱、疾病的转归密切相关。“人生而有形,先天之精气,惟赖后天水谷之充养,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百病不已,宜从中治”。脾为后天之本,不仅论述了脾的功能特点,更在于指导临床用药。顾护脾气,维护一线生机,是治病求本的重要内容。临床上林老坚持从脾入手论治,根本得固,诸脏得养,便能屡起沉疴。唐·孙思邈云:“五脏不足,调于胃”,李东垣云:“其治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惟益脾胃之药为切”,实为金针暗度之名言。

对于此类患者,提前采用健脾益气法治疗,便可减少甚或预防以上证候的发生。而出现之后采用此法治疗也能缓解病情,明显改善生存质量。益气健脾法治疗乳腺癌,林老常用的方剂有参苓白术散、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常用的药物为黄芪、西洋参、高丽参、当归、太子参、党参、云茯苓、白术、红枣、莲子、扁豆、陈皮、苍术、麦芽、稻芽等。

脾与胃一升一降,脾脏胃腑互为表里,林老临证健脾不忘养胃和胃。李东垣提出“善治病者唯在调理脾胃”,升降运动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而脾胃之气的升降协调对整体气机的升降出入至关重要,是为枢纽。只有脾胃功能正常,气机升降出入有序,才能维持“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之各项生理功能。林老在运用益气健脾法的同时十分重视脾胃气机调理,治疗上紧紧抓住脾气宜升,胃气宜降,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的特点,或温阳益气,或健脾消导,并灵活应用燥湿、化湿、利湿之法使脾胃升降调和,正气自安。而脾本虚证,胃多实证,虽有偏气滞、湿阻、化热、食滞、血瘀等不同实证,但其基本病理均为虚中有实、虚实交错、实由虚致,纯属脾胃虚弱而不夹实者较少见。临证中凡一切影响中焦脾胃功能诸如益气、温中、清热、

消积、健脾、行气、升陷、降逆、燥湿、祛痰、芳化、养阴、生津、泻下、固涩等法，均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恢复中焦功能，宜科学合理搭配选用。总之，脾宜健、胃宜和。

② 滋阴补肾或温阳补肾法

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根、阴阳之宅、水火之脏，藏真阴寓元阳。“久病不已，穷则归肾”，肾气之盛衰关系到人体脏腑功能及抗病能力。林老扶正极为重视肾的作用，认为它是人体“精神之所舍和元气之所系”，十分赞同“五脏之真，惟肾为本”之说。这是因为：首先，“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所藏之精是人生殖、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本源，主机体生、长、壮、老过程。同时肾中元阳元阴为一身阴阳之根，温煦濡养着脏腑、组织，是激发、推动各脏腑功能活动的原动力。是故肾为五脏之根，生命之本。其次，肾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肾不仅内藏先天源于父母之精，且吸纳“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脏腑功能正常，先后天之精微相互补充，既是脏腑功能活动的保障，又是肾得以蛰藏精微及其生理功能正常发挥的前提。所以肾与五脏、先天与后天，互生互养，生机不殆。

治法当遵《难经》“损其肾者，益其精”之明训。林老在扶正固本中善于运用滋阴补肾或温阳补肾，察其阴阳所在而调之，亦不偏执，以平为期。治肾总的原则是培其不足、不可攻其有余，正如赵献可“火之有余，缘真水之不足也，毫不可去火，只补水以配火，壮水之气以制阳光；火之不足，因水之有余也，亦不必泻水，就于水中补火，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此其常也。”滋阴补肾方面常用六味地黄汤、知柏地黄丸、二至丸或左归丸，药用女贞子、旱莲草、枸杞子、桑椹子、生地黄、熟地黄、麦稻芽等，补而不膩；温阳补肾方面，常用方剂有二仙汤、右归丸，药用淫羊藿、仙茅、肉苁蓉、制首乌、菟丝子、补骨脂、知母、黄柏等，温而不燥，以达温肾助阳，调摄冲任，固摄先天。

③ 脾肾双补法

乳腺癌患者在围化疗期及巩固期常可出现头晕目眩、面色少华、耳鸣脱发、气短乏力、食欲不振或食后腹胀、恶心、呕吐物清稀无酸臭味、形寒肢冷或五心烦热、腰膝酸软、月经失调、小便频数而清或夜尿频、完谷不化粪质清稀或便秘、舌淡苔薄白、脉细弱无力等脾肾两虚之候，治疗当施以脾肾双补，兼顾先后天之本。因为脏腑之生机在肾，补养在脾，脏腑失调、脾肾俱虚时，林老先补脾以资化源，益肾以固根本，将脾肾阴阳气血融为一体。林老常用六味地黄丸合四君子汤加减，药选黄芪、女贞子、人参、党参、白术、云茯苓、怀山药、黄精、山萸肉、熟地黄、天冬、麦芽、稻芽等。方证适宜、补而不膩，从而使正气得固，正胜邪退，预防与抑制癌瘤的复发转移。

2. 适时祛邪

意指在“时时扶正”的基础上，根据乳腺癌疾病的进程、邪正的演变以及病机的转归情况，适时地施以祛邪药物，使邪去正安。林老认为在乳腺癌发生发展过程中，虽然正气亏虚是其决定因素，但作为矛盾的另一方，邪气的存在亦会不断销蚀人体正气，促进癌瘤发展转移，从而影响疾病的进程，有时甚或成为这一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治疗乳腺癌之时，务必在“时时扶正”基础上，适时地投用祛邪之品，同时根据机体状况、正邪对比来确定攻补主次，正确把握“适时”是关键。

林老认为在乳腺癌不同的阶段，邪正力量的对比必定有明显之不同。病之早期，正虚尚不十分明显，而邪气常占上风，此时治疗可偏重祛邪兼以扶正，注意祛邪不伤正，待邪去而正安。病之中期，一方面因正气不断损耗而正虚逐渐明显，另一方面邪气不断积聚盛实，邪实亦相倚而立。此时治疗当扶正祛邪并而用之，或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一进一退之间，邪去而正复身体渐趋安和。病之晚期，由于邪气持续销蚀耗损正气，正虚成为矛盾最突出的一面。此时治疗应以扶正为主略加祛邪，甚则全投补剂，如此才可挽回一线生机。待正气渐复、脏腑平衡，则自可抵御邪气，以求人瘤共存。乳腺癌一旦出现复发转移，既变防渐、人瘤共存、带病延年成为治疗的主要目标。此时林老主张扶正祛邪兼而行之，并以扶正为主导。对于生存期5年甚至10年以上、西医诊断指标为“临床痊愈”的患者，林老亦主张定期调理，采用“流通气血，疏通经络，平衡脏腑，燮理阴阳”的调治方法，以防“死灰复燃”。对于此阶段的治疗，林老主张以扶正为主，偶尔兼顾祛邪。

除了依据疾病不同阶段适时祛邪外，祛邪之轻重与时机还应根据现代医学手术、化疗、放疗等治法的应用情况而有所不同。手术、化疗、放疗等相当于中医峻猛祛邪之法，在切除与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

使机体正气遭受严重损耗,此时中医治疗不宜再投祛邪之品,而应及时扶正为主,与此同时还须根据正气损耗及毒副反应情况,审慎选用祛邪之品。乳腺癌常用祛邪方法有化湿祛浊、清热解毒、活血化痰、化痰软坚等。林老认同以毒攻毒类药物如全蝎、地鳖虫等对癌细胞的细胞毒性作用,但不主张使用虫类以毒攻毒之峻品,尤其对复发转移性乳腺癌患者(除脑转移导致抽搐明显者则选用地龙、蜈蚣、全蝎)。虫类搜剔等峻猛药物的抑癌作用远不如现代医学放化疗手段直接、快速,若患者经解救放化疗后仍不能控制病情进展,此时再用以毒攻毒类虫药不但难以抑杀癌细胞,更可能因攻伐伤正,而使正气更虚。临证主张“五脏皆虚独取中州”、“养正积自消”之原则,发挥中医药参与乳腺癌治疗的优势,多能取得良好效果。

此外,林老认为临证中扶正与祛邪这两类药物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具体运用亦非孤立不变。如黄芪、人参、白术、云茯苓、麦冬、黄精、女贞子等药不仅有扶正的作用,而且还有抗癌、抑癌作用;而蛇舌草、莪术、半枝莲、龙葵、鱼腥草、金荞麦、丹参、薏苡仁、鳖甲等药则不仅可抗癌,还可扶正。因此,如能根据病情需要,恰当配伍施药,兼顾对证与治病、扶正与抗癌,方为善中之善也。

3. 随证加减

“随证加减”意指在“识病为本、辨证为用、病证结合、标本兼治”的原则下,在综合全面考虑乳腺癌疾病的基础上,在“时时扶正、适时祛邪”的指导下,依据病人就诊时所出现的各种证候表现以及现代医学检查诊断指标中的关键病理环节,采取病证结合的模式,有针对性地治疗。根据病与证的不同侧重,林老强调以证为纲,治随证转,证同则治同,证异则治异。

实际运用中乳腺癌患者临床情况极为复杂,体质因素、季节因素、地域因素等都会影响到机体的邪正盛衰、证候变化,对此则应三因制宜。《灵枢·寿夭刚柔》:“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短有长,有阴有阳”,说明人的禀赋在生理上有其差异性。《素问·五常政大论》谓:“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低者气热。”由于生活地区不同,禀赋亦有区别。是故临证须将患者居住地、生活习性亦作为辨证的重要内容之一,既注重辨体质之强弱,病情之寒热虚实,又要考虑其地理环境的高卑润燥。《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必先岁气,毋伐天和”,在不同的时令、季节用药亦有所不同。四时气候的变化,必然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体,从而使人体脏腑、气血亦产生相应变化。由于季节气候不同,人体气血阴阳亦有偏颇,故在辨证时应注意这些特点,适当加入季节应时之药,其效必佳。如气候多雨潮湿,用药可偏于辛燥;而气候干燥、久旱无雨时,用药则应甘润。以辨证论治为总原则,这样即可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补其不足,泻其有余,以调和脏腑气血阴阳。总之,乳腺癌患者病情千变万化,错综复杂,治疗用药应遵循天人相应原则,权衡轻重缓急,随机应变,谨守病机,审因论治,观其人、其证而施药,有是证用是药,避免偏弊之差。据证立法,依法组方遣药,做到理、法、方、药完整统一,方能体现辨证论治之精髓。林老强调辨证论治最基本的要素仍在于整体观念、动态观察、灵活加减。